

四史  
典籍  
原典



## 桐江一丝扶汉九鼎

■ 孙东岳

北宋诗人黄庭坚在《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》有诗云:“平生久要刘文叔,不肯为渠作三公。能令汉家重九鼎,桐波江上一丝风。”

诗中刘文叔即汉光武帝刘秀(字文叔),严子陵即严光。这首诗是赞美严光的。

严光是刘秀的好朋友,可他不愿当像三公(东汉时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,是朝中最高级别的官员)那样的高官,而是隐名埋姓于桐庐富春江畔垂钓。能使汉朝政权稳固的,竟是桐江波上那被风吹动的一根钓丝。严光到底有何作为,能对国家政权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?

《后汉书·严光传》记载:“严光字子陵,一名遵,会稽余姚人也。少有高名,与光武同游学。”另据《严氏家谱》,严光父亲严士恂当过新野县令,严光少时随父亲来新野居住,那时刘秀到新野姐夫邓晨家避难,两人相识。

严光少年博学,刘秀胸怀大志,二人一见如故,相见恨晚。后来严士恂期满离任,严光也回到了家乡。两人再次相遇,是到长安求学,并结为挚友。

王莽篡汉后,刘秀在南阳起兵,严光在军营多次为刘秀出谋划策,并推举了邓禹、马援等大将,帮助刘秀扫平群雄,登上皇位。

刘秀即位后,严光本可以高官厚禄,却隐居起来。刘秀想到他的贤能德才,就派人四处寻访,终于找到了严光。光武帝派使者礼聘严光,往返三次才将他请到洛阳。

严光到了京城,拒绝与达官显贵交往。侯霸昔日同严光素有交情,当时是权势煊赫的大司徒,他自称公务繁忙,要严光委屈一下傍晚去见他。而严光则视其为粪土,就丢过去一片竹筒给来人,口授回信讥刺侯霸:职位做到宰相,很好。身怀仁爱,辅佐正义,天下就会喜悦;阿谀奉承,顺随旨意,身首就会异处。

刘秀当天就来到严光住的客馆,严光卧床不起。刘秀进入他的卧室,友好地抚摸着他的腹部,请他出山辅佐。严光闭目不应,良久才回答:人各有志,不能相逼。

刘秀把严光请进皇宫,论道旧故,相对累日。刘秀问严光:我比起过去怎么样?严光并没有夸奖他,淡淡地回答:陛下比过去稍稍好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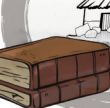
《后汉书》还写到,两人晚上作彻夜长谈,然后同榻而眠,夜里,严光一只脚压在了刘秀身上。

即使面对当朝皇上,严光也依然没有失去初心,一切都还是与刘秀初交时的真面目、真性情,没有矫揉造作,没有趋炎附势,没有阿谀奉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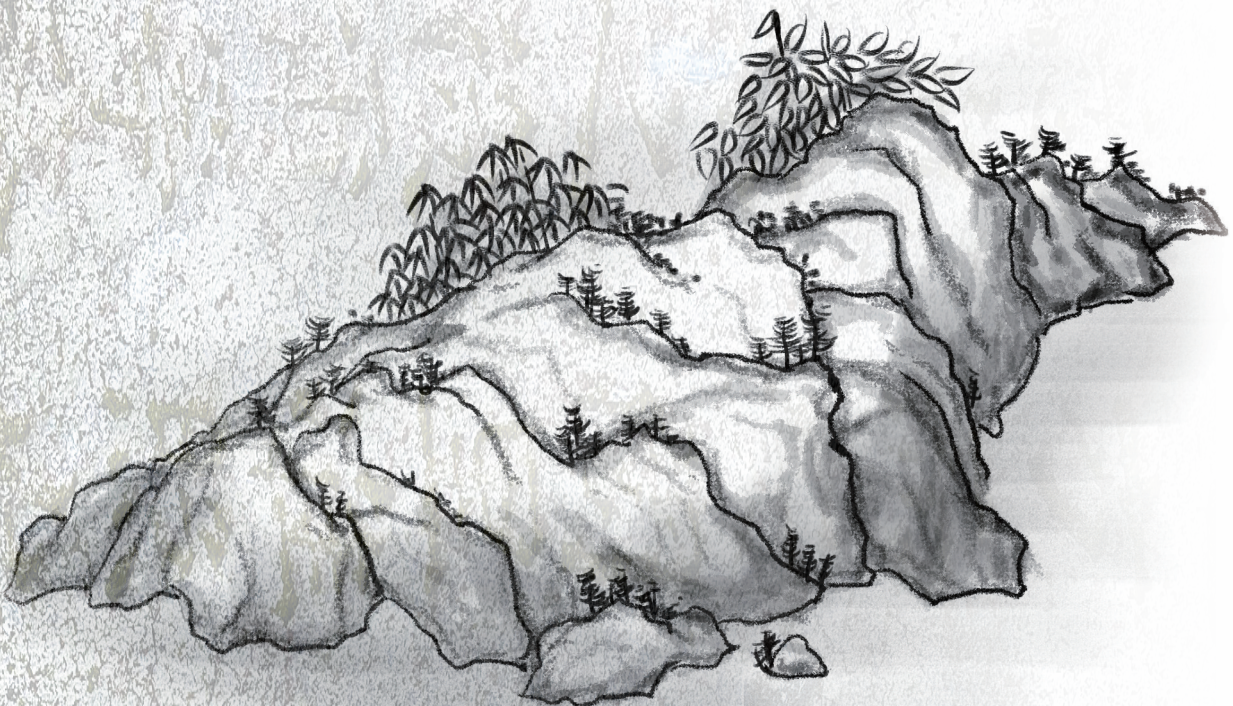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,严光还是拒绝了光武帝的邀约,放弃高官厚禄,回到富春江边,过着农耕渔钓的隐居生活。他这种不慕富贵,淡泊名利,崇尚气节的品行,不但对当时天下士子有重大影响,也一直被后世推崇备至。北宋梅尧臣赞曰:“不顾万乘主,不屈千户侯,手澄百金鱼,身披一羊裘。”范仲淹在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中也有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的赞语。明代思想家蔡清在《易经蒙引》也称赞道:“故桐江一丝,扶汉九鼎,节义之有益于国,固如此。”

刘秀不愧是一位有作为的复国君主。他审时度势,鉴于西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,社会动荡不安,多少有知识、有修养的士子儒生都隐居岩穴,避开乱世。建立政权后,他四处访求严光,提拔被遗落的人才,意在实现“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”的政治理想。严光的不拘礼节、恃才傲物的态度,刘秀也不计较,不怠慢,是他礼贤下士、任人唯贤、宽厚待人,以“柔道”治天下的具体体现。

文史  
荟萃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

## 海南碑刻禁约文化

# 石头上的民风民情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吴钟朴

### 社会约束功能

“以凭拿究,决不稍微宽贷”

或立于田头路边,或倒在荒野山坡,或被陈列展馆,海南现存的清代以来的官府禁碑和乡规民约碑记,形式各异,尽显沧桑,但凭借一方顽石,默默地记录了海南岛一些散落的文化痕迹,让后人可在其字里行间寻找那些日渐远去的故事。

根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海南发现的禁约碑刻至少有15块,它们分布在各市县,碑上文字除少数因风雨侵蚀变得模糊外,多数清晰可辨。

“官府禁碑”是由官府下令勒石发布的,属官方制定的文件,因此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;“乡规民约”一般有“奉官(道、府、县)示禁(谕)”“奉官给示”等名称,从这些名称可以看出,它们虽属民间行为,但必须由官府批准方可立碑,因此可以说是官方意志的延续,是与官府保持一致的。

已故海南乡土作家王俞春曾总结“禁约文化”的一些历史功用。

首先,古代禁约对维护当时地方的社会治安,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,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其次,禁约条文是根据当地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,由民众和民众代表呈报官府后批立的,反映了老百姓的要求和意愿,具有较强的针对性。

再次,禁约采取勒石立碑的方式谕示,长期广而告之,使老百姓知法守法,有利于提高民众守法的自觉性;此外,禁约对研究海南古代的历史人文、生产生活、社会治安、民风民情和风俗习惯等,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在海口府城南面1公里处的丁村,有2块完整的古碑,一块是立于清嘉庆六年(1801年)的“奉县示禁”碑,另一块是光绪十一年(1885年)仲秋所立的“重修约亭碑”。

“奉县示禁”碑的主要内容是当时一位姓郑的琼山知县,根据丁村洗性才等村民的呈请,勒碑严禁拦匪游手棍徒扰害地方,掳掠田园,占毁篱界,纵畜残害田业等行为;警告邻近乡村有上述行为之徒,必须遵守示禁条例,若被丁村人指名投诉,县里将“以凭拿究,决不稍微宽贷”;碑的左边落款有丁村洗、陈、钟、周、潘、王、张、吴、黎等各姓224名父老的姓名。

时隔80余年后所立的“重修约亭碑”,则从根本上说明了重修的原因:“……在使一方之善良,有所观感以为善,而少年子弟之不轨者,必有所触目,有约束而不致于为非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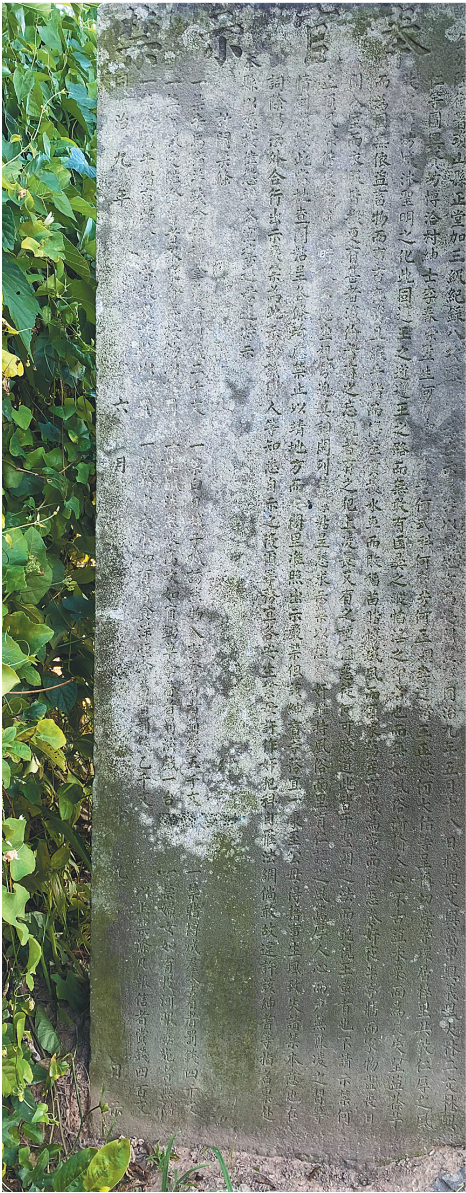
### 记录社情民风

“阴地不如心地好”

在府城南南部潭社村前的路边,也树有一块清代咸丰五年(1855年)所刻的“奉县示禁”碑,由当时的琼山知县李维崇批立,内容有禁止私售鸦片、禁止窃采莲子监控莲藕、禁止在潭中捕鱼捞草、禁止白天在井边裸浴等11条禁例。

紧靠该碑的右边,有另一块“奉官示禁”碑,它们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,立碑时间是民国十一年(1922年)九月十六日。

据一些上年纪的村民回忆,潭社村民风淳朴,历史上申请立碑的目的是制止附近一些不良分子的骚扰,如经常有人勾结村里的个别年轻人,到村里吸食鸦片、盗窃耕牛、偷采莲藕等,影响到大家伙的正常生活,也败坏村子的名声,对年轻一代娶妻嫁



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群村的“奉官示禁”碑。 陈耿 摄

女十分不利。

类似的还有文昌龙楼镇山海村等14个村庄联名请立的“奉谕示禁”碑,该碑立于清咸丰七年(1857年),内容涉及家庭财产、六畜、农作物和林木的保护,对盗窃者的处罚和对揭发者的奖赏都有明确的规定,可谓有根有据,奖罚分明。

重读古代官府禁碑和乡规民约,可以发现碑文中透露出丰富的文化信息,海南岛历史上的社情民风似乎历历在目,这又正是正史和方志里所没有或无法一一记载的。

文昌市孔庙大院内有一块禁碑,由于长年受风雨侵蚀,字迹正日益模糊。

该碑全文近700字,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海南禁碑中篇幅最长的一块,碑额为“署文昌县正堂晓谕勒石示禁”,立碑时间是清咸丰八年(1858年)九月。

碑文写到,文昌历史上民间官司中十有八九与坟山有关,原因是一些迷信的人轻信风水先生的说法,只要是听说风水好的地方,便千方百计去图谋,据为己有,引起不少民间纠纷和诉讼。

鉴于此风恶劣,碑文对百姓进行了教诲:“地乃水、火、风凝结而成,外象藏风避水,内穴无水无风,即谓之‘风水’?即可称‘吉壤’?非别有风水果能朝葬夕发也。况谚云:阴地不如心地好……”

因此,该碑严禁毁人坟墓,灭人碑记等行为,否则一经告定,严惩不贷。

### 彰显人文情怀

“严禁私采亚玉山”

昌江黎族自治县的石碌铁矿,品质之优,亚洲闻名,该矿还伴生有钴、铜、镍、金等矿产资源。早在明代,就有人盗采石碌岭上的铜矿。据《昌化县志》记载,崇祯二年(1629年),知县张三光赶走矿盗,严禁私采亚玉山(即石碌岭)。

清代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,代理昌化知县李玉章在今石碌镇西郊的水头村立了一块石碑,严禁私采矿山。目前,此碑尚立于水头村,但碑额右上角已缺,仅村左上角一残缺的“碑”字,当地人不知道它原来的名称,一般都称之为“禁采石碌”碑。碑文共120字,除个别字因风雨剥蚀而残缺外,基本意思尚可领会。

昌化县为什么要禁采石碌矿山?《昌化县志》没有说明,倒是清末琼州人士陈献章在《琼崖》一书中认为有两个原因:其一,“因山崩压毙土人多人,官厅遂勒石严禁私挖”;其二,私人采挖,“获利甚厚”,是为朝廷所绝对不允许的。

由此可见,古人就有不让国有资产(矿产资源)流失的意识,且保护矿山免遭私采,首先便是保护当地百姓的人身安全,是颇具人文关怀的做法。

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有一块始立于光绪六年(1880年)的“奉官示禁”石碑,碑上的8条禁约,有3条明确“禁刀斧不得入山砍”“禁盗砍芦林竹木”“禁不得盗割竹笋”,足见当地向来就有环保意识,注重生态平衡。

### 监督舆论功能

“勒碑禁免,不得加派”

在海口羊山腹地永兴镇境内,有个长流不涸的“玉龙泉”,泉水汇流成湖,湖边有座“龙庙”,龙庙即历史上的“石湖书院”,明代琼山进士郑廷鹄曾在此读书著述。

在石湖书院的横廊里,堆放着不少古代石碑,其中一块为“奉县给示”碑,所立时间为清代嘉庆三年(1798年)十二月。它曾对官府起到监督和提醒的作用,使当地百姓三度免征差役。

原来,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永兴、石山一带的百姓推举8名代表向“琼山县正堂”提出申请,称当地已有人在府衙充当“吹手、仵作、石匠”等徭役,鉴于“王政之仁,役此免彼”,希望官府免除后来加派的“泥水小工、稻



文昌龙楼山海村的“奉谕示禁”碑。 陈耿 摄

草、荆棘、糞羊”等役,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。这一申请得到了批准,并“勒碑禁免,不得加派。在案”。

后来,由于年久,禁令松弛,乾隆十七年(1752年)官府又发票征取“泥水小工、稻草、荆棘、糞羊”等徭役,于是,当地百姓联名抄碑,呈请府宪查禁,又得到了批准。

嘉庆三年,以前的勒碑虽然还在,但禁令已经再次松弛,且记录在案的文件开始漫漶难辨,加上新任的书吏、差役不知以往的免役禁令,因此又重新征调“泥水小工、稻草、荆棘、糞羊”等差役。

于是,永兴、石山等地百姓再次上书要求减免,得到恩准后,又重刻石碑,以便日后监督和提醒在官府当差的人,若有差役无端混派,老百姓有权到县里投诉,提请追究相关人的责任。

### 保护通商贸易

“安行旅而敬刁风”

此外,还有一些禁碑是为保护沿海通商贸易而设立。

清代道光年间,文昌县船户韩泰益等人的船只遭风搁浅在海南岛东北部海域,遭到当地一些刁民敲诈勒索。而据琼州府的在案记录,在此一带,只要有船只搁浅,一些奸徒不但扣下船只抢夺财宝,甚至拆毁船只,迫使客商停留住宿,然后再趁机对他们进行讹诈,稍不随意就持刀动斧,不许客船修整,还有人干脆拆船卸货。更甚的是,碰到客船上有水手病故或落水身亡,一些村民便前去争相认尸,搜索死者身上的钱财,其情形令人痛恨。

为了“安行旅而敬刁风”,针对上述恶俗,琼州知府于道光十九年(1839年)下令禁止这些行为,并在铺前墟上立“奉府示谕”碑警醒沿海村民渔户,“遇有船只或遭风漂泊,经遇沙搁浅,沿海村民渔户等人不许集众成群,以救护为名乘危抢夺,指称寄往田业桑园,借故讹诈……”

禁令最后明确:“自示之后,尝有不遵,或被查拿,或经被害之人呈告,必照乘危抢夺之创,加重究办。”琼州府的这一禁令,有力地保护了文昌沿海一带的通商贸易,也有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歪风邪气和一些不法恶徒。



海口府城潭社村外的禁碑。 陈耿 摄